

摘要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关键词 全球安全倡议 国际安全 全球安全治理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王秋怡，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037）。

** 本文系外交学院“双一流”建设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安全战略”创新团队成果。论文写作得到团队首席专家王帆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其他团队成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大国竞争加剧、安全议题增加、安全治理乏力，已经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发展。无论是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等传统安全议题，还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全球安全治理都呈现出明显不足。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失灵、全球安全治理能力欠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断强化盟伴体系，导致全球安全碎片化加剧，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构成挑战。美西方奉行联盟安全，不断营造政治集团和阵营对抗，也使得大国协调推动全球治理改善的动能减弱。全球安全议题层出不穷，全球安全体系改革踌躇不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不进则退”的危险局面。为此，全球安全治理亟需变革，需要新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和方案，推动全球安全合作加强，谋求更加普遍安全的世界。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改革与完善。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劝和促谈的作用，推动了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在 2022 年 4 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① 2023 年 2 月，中国政府又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对该倡议如何实践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指南。目前该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认可和支持。这表明全球安全倡议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指导，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于全球安全倡议的研究主要涉及全球安全倡议的背景、内涵、价值、实践、挑战等方面。这些研究对于了解全球安全倡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政策诠释多，理论分析少，理论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对于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有待深化。因此，本文研究拟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探讨当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背景与价值；第二部分论述全球安全倡议的历史与理论逻辑，从政策性和学术性两个角度对全球安全倡议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结合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实践分析其落实路径；第四部分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总结，探讨落实倡议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①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2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一、当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推进，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全球安全治理而言，主要面临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与地区安全格局动荡；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且相互交织；三是全球发展赤字加剧安全治理失衡；四是全球安全架构松散导致安全风险增大。

（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

近年来，国际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大国战略竞争激烈，权力政治强势回归，地缘政治再度兴起，国际安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一是中美关系持续低迷，双方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中美关系几乎全面恶化。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① 注重通过强化盟伴体系加以施压。具体而言，其一是美国积极构建多层次联盟体系，强化对华多边施压。美国认为盟友联合起来的力量将让中国难以忽视，可以更加有效地制衡中国。^② 其二是美国对中国内政介入加深，双方意识形态竞争凸显。美国将人权问题视为其“价值观外交”核心部分，通过不少涉疆、涉港、涉台等法案或备忘录，不断介入中国内政，还将“人权问题”与经贸、科技等挂钩，导致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凸显。^③ 其三是中美合作有限，两国关系转圜更加困难。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以竞争为基调，不仅延续特朗普政府在经贸等领域对华打压，还在科技领域采取更加精准的“小院高墙”策略，推动中美技术脱钩，导致中美关系显著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合作越发有限，在气候治理和人文交流等领域进展缓慢。总之，中美战略竞争改变了两国关系进程，导致全球安全分化加剧，大国协调动力削弱，全球安全风险增加。

二是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凸显，国际安全局势严峻复杂。乌克兰是美俄对抗和博弈的前沿阵地。乌克兰危机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欧洲安全面临巨大挑战，美欧俄冲突加剧。随着危机持续发酵，其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②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③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March 25, 2021, <https://www.presidency.ucsh.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1268>.

外溢效应愈加明显，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以及难民问题等波及范围扩大，各类安全形势严峻。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美俄关系恶化的产物，美国试图联合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对俄罗斯进行打压。乌克兰危机所折射的集团对抗、零和博弈等思维侵蚀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基础，也破坏了欧洲安全格局。

三是北约扩大埋下安全隐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北约扩大的实质是谋求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延续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2022 年 6 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出台《北约 2022 年战略概念》文件，认为俄罗斯“对盟国安全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同时认为中国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①因此，北约扩大有“双管齐下”之意。在欧洲拉拢瑞典、芬兰等国加入，导致欧洲安全局势更加复杂。在亚洲邀请日、韩、澳、新西兰四个亚太非北约成员国参会，将触角深入亚太地区，其“亚太转向”将给亚洲地区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②

（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当前各种安全问题不断增加且类型多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互影响、叠加共振，全球安全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一是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非传统安全重要性显著上升。传统安全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大幅增加军费，强化军事同盟，展开大国军备竞赛，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军事威胁增大。此外，由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问题引发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不断，地区局势危机四伏。非传统安全方面，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气候变化难测，粮食危机、网络安全等问题突出。由于非传统安全议题更为广泛，涵盖国家、跨国组织与集团、个人等主体，因而其影响具有较强跨国性、全球性和社会性，^③更易产生外溢效应。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衍生和流变使其与传统安全问题的界限日益模糊，复杂性增加、治理难度加大，同样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二是全球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日益凸显。2017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的论

^①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iles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② 金玲：《“全球北约”的亚太转向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2 年第 9 期，第 44 页。

^③ 汤光鸿：《非传统安全——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9 期，第 19 页。

断。^①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普遍联系于整体之中，各国利益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全球安全问题凸显给全人类带来诸多共同挑战。全球安全问题的“联动性”强调整体安全布局由各安全因素所构成，各因素的转变会影响安全问题的整体呈现，一国或某地区的安全问题会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跨国性”强调全球安全问题的“涟漪效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绝对安全而独善其身，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多样性”强调安全问题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扩展，导致全球安全议题复杂化，全球安全治理难度加大。

三是全球安全脆弱性、碎片化愈益显著。全球安全议题不断增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使得安全威胁来源及表现形式复杂多变。然而，国际安全机制供给不足，且各种机制之间缺乏共识、竞争加剧甚至走向对立，碎片化现象严重，致使全球安全更显脆弱，对其治理顾此失彼，各国安全风险总体增加。

（三）全球发展赤字加剧安全治理失衡

当前，全球经济风险增加，各国经济发展失衡。疫情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加之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内顾排外等孤立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国家奉行去全球化、“小院高墙”以及极限施压等手段和举措，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增加，全球发展赤字持续加深。

全球发展与全球安全高度关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全球发展赤字加剧成为安全治理失衡的重要原因。

一是全球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全球经济的南北差距依然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迟迟难以改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等负面做法，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失衡。202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各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呈现不均衡状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呈现明显差异。^② 二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短时期内修复困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世界正面临接踵而至、错综复杂的全球性危机和冲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各项目标处于岌岌可危之中。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不堪且参差不齐，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主要供应链中断、劳动力市场

^①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

^②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January 30,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

压力日益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债务不可持续等问题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① 全球经济复苏尚需时日。三是全球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社会不公现象明显增加。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受挫，全球减贫进程受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2022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指出，在涵盖 111 个发展中国家的 61 亿人口中约有 12 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占 61 亿总体人口的 19.1%，其中约有 5.93 亿人口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② 受此影响，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和人口群体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冲击。妇女失业比例更大，对妇女的暴行增加，青年就业困难，童工和童婚现象也在增长，社会不公现象明显增加。四是政府失能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日益滋生。全球发展赤字加剧还导致一些国家出现政府失能，难以进行有效的国内治理，甚至连国内秩序都难以维持，由此也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断增加，在发展中国家体现的更为明显。2022 年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阿富汗、布基纳法索、索马里、马里、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尼日利亚是反恐形势最严峻的国家，所有恐怖袭击受害者中的 85% 来自排名前十的国家。^③ 总之，全球发展赤字的加深无疑增加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困难，也使得统筹安全与发展更加迫切。中国积极探寻全球发展赤字的改善，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四）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导致安全风险加大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架构。随着国际安全环境变化，既有国际安全架构的有效性也饱受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冲击，与各国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④ 从既有的全球安全架构来看，一是基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模式，二是建立在零和博弈思维上的对抗式安全模式。两种模式都出现了架构松动，增加了全球安全风险。

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的集体安全模式受欧洲传统外交“大国协调”原则的影响，强调大国合作和大国一致，这也意味着一旦国际社会发生分化，这

^①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June 2, 2022, <https://s3.amazonaws.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2/2022-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pdf>

^② “2022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October 17, 2022, <https://www.undp.org/arab-states/publications/2022-global-multidimensional-poverty-index-mpi>

^③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2”, March 2, 2022,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terrorism-index-2022>.

^④ 徐步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路径笔谈》，《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24—33 页。

种模式就会陷入相互否决的瘫痪之中。^① 俄乌冲突加剧了集团对抗和阵营对立，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大国协调困难重重，集团对抗取代机制合作，大国高强度对抗风险上升，削弱了全球安全架构的基石。

对抗式安全模式强调为追求小集团或自身的绝对安全，无视他国和全球安全，是一种自私且危害极大的安全模式。现今这种模式更多以集团划分、阵营对抗等形式表现出来。在欧洲和亚洲，美国主导的多边和双边联盟都是冷战时期地缘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对抗性。冷战后美国推动这些联盟关系转型和升级，无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妨碍其他安全机制和合作平台的有效运转。^② 美国推动北约扩大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多边转向，将经济、科技、人文等议题安全化，使得地区安全架构面临更大挑战。

二、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和逻辑

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受挑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必要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中国维护全球安全与发展的大国担当。

（一）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

首先，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意愿增强。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探寻符合全球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对全球安全治理的认知与能力。新世纪前，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努力推动争议问题解决，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相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等理念，表达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目标、原则、路径等诉求。中国还参与并推动联合国机制改革，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进一步加强在网络安全、极地治理等新型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意愿显著增强。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能力提升。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一是中国增加了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如 2015 年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中方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并设立了 8000 人维和待命部队，牵头成立

^① 苏长和：《全球安全架构设计的理论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28 页。

^② 徐步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路径笔谈》，第 24—33 页。

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组。^① 中国还对非洲等地区提供了大量安全援助。二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领域不断扩展,在消除贫困、灾害救援、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气候变化、海洋安全等领域,中国都承担起大国的安全责任。三是中国在安全治理中的贡献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中国在解决地区冲突,推动双边、多边安全对话,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响应。

最后,中国积极探索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全球安全治理方案,以缓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国际安全的新形势呼唤国际安全的新理念和方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为改进和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当前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亟需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的方案,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无疑回应时代需求,体现中国担当。

(二) 从新安全观到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有其历史和理论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以往提出的安全理念一脉相承,从理论逻辑来看,其比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观更为合理,适用于解决当前的全球安全问题。

1.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带来了地缘政治的重塑,也引发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剧变。全球安全治理面对新情况需要新思路,对此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安全观。

1997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安全观”概念。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② 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在多种场合倡导和阐述新安全观,并将其内涵调整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指出,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从安全内容来看,主张综合安全,安全涵义已从单纯军事和政治安全演变为包括经济、环境、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的综合安全。从安全手段来看,主张合作安全,强调通过对话、协商来促进安全;从安全威胁来看,霸

^① 《中国代表就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阐述中方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2月22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2/content_5742694.htm。

^②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

权主义、强权政治被认为是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① 总之，新安全观认为，综合安全是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共同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标，合作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②

在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中国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活动，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机制，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

2. 总体国家安全观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国家安全更加重视，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2020年12月，习近平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进一步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政治属性，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形成。^③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我国安全观的重要发展，实现了内外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与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多重统筹。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④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架构，涉及各领域安全可以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扩展而调整，不同领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会动态变化。^⑤ 如2020年将生物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发展。

为了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加强了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一是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二是创新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三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四是完善国家安全方略谋划；五是推进国家安全宣传教育。^⑥ 不过相对

① 阎瑾：《浅析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1期，第33—35页。

② 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0页。

③ 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第1—3页。

④ 陆忠伟：《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第22页。

⑤ 高祖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第4—10页。

⑥ 刘跃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人民论坛》，2017年12月（上）期，第38—40页。

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多是对内的国家安全治理思考，而并非完全针对国际安全合作。

3. 亚洲安全观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①此后，习近平又把亚洲安全观扩展为对世界普遍适用的安全观，倡导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亚洲安全观的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共同安全是原则。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普遍、平等、包容。二是综合安全是内容。综合安全要求注意到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多元性和联动性，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三是合作安全是手段。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四是可持续安全是目标。可持续安全注重安全的差异性、阶段性、长远性，体现了发展安全的理念，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实现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

此后，“亚洲安全观”在《中国国防白皮书（2015）》《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19）》之中都有体现，肯定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理念对于国际安全合作的积极意义，体现了中国安全理念创新的广泛实践意义。

4. 全球安全倡议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加强安全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和平与稳定。2023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涵及其实践主张。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当前，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②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③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六个坚持”。一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二是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①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聚焦亚信第四次峰会）》，《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1版。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15版。

③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2022年4月24日，第6版。

是基本前提；三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四是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五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六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①“六个坚持”既有顶层设计的宏观思维，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路径，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②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安全赤字的中国方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将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破解人类面临的安全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念和思想引领。^③为了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目前已争取到 80 多个国家和组织的认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更是对 20 个重点合作方向进行了阐述，要利用联合国大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平台和机制，推动全球安全倡议不断发挥作用。

从新安全观到全球安全倡议，都体现了中国对安全问题的客观认知和理性思考。相对于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而言，全球安全倡议是继承与发扬，不仅延续了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坚持，更是结合形势变化对安全实践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逻辑

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价值，实现了对美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观的超越与创新。

1. 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此凝聚安全观念共识。当今世界，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安全联系非常密切，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对“共同安全”的追求，这与西方国家奉行的“零和安全”显著不同。

其一是安全威胁的共同性。当前，安全问题的多样性、跨国性和联动性更加突出。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唇齿相依，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④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是鉴于一些安全威胁具有共同性的客观现实，也体现了更加广阔的全局意识。以联系和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深刻把握全球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②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③ 王帆：《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外交方略》，《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3页。

④ 徐步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施路径笔谈》，第21页。

安全问题的整体性和各国安全的不可分割性。^① 其二是安全目标的共同性。中国历来强调各国之间安全共享，安全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正如习近平指出，“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也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② 坚持安全目标的共同性，实际上就要求各国最终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安全共同体，摒弃零和安全对全球安全的割裂与分化。其三是安全合作的共同性。共同安全的实现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参与，各国参与越广泛，共同安全才越有可能。对于新冠疫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付，需要各国共同行动才能有效应对。

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共同安全超越了片面的国家安全、局部安全，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目标。

2. 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

其一是安全议题的综合性。当前各种安全议题不断出现，既有领土争端、地缘对抗、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更有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诸因素及其治理模式既存在差异，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面对不断增加的安全议题，加之“安全化”、“政治化”的冲击，需要以综合视野进行研判，予以科学分析与综合应对。其二是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中国倡导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主张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审慎动用军事手段。也即根据不同安全议题的特性，选择合理适宜的手段，注重对各类安全问题标本兼治。其三是安全主体的综合性。当前安全主体不仅有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一些公司、族群甚至个人等也成为影响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鉴于安全主体的综合性，全球安全倡议也注重构建多元的综合治理模式。

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多关注传统安全议题，突出军事手段，对非国家行为体也相对忽视。而全球安全倡议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统筹谋划应对各类潜在安全威胁，既通盘考虑地区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又强调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③

3. 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

传统安全观认为，各国安全具有同质性，忽视了各国在安全需求、安全

① 肖晞：《全球安全倡议的中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3日，第3版。

②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③ 赵可金：《全球安全倡议的创新性》，《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31—135页。

能力、安全合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安全倡议则更多考虑到“差异安全”，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安全问题，统筹安全与发展。

其一是各国安全需求的差异性。各国安全需求因地缘政治、发展阶段、战略导向等因素存在差异。各国对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注有所不同，对于各类安全议题定位的轻重缓急存在差异。只有正视各国安全需求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各国的安全关切。其二是各国安全能力的差异性。各国安全能力因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战略偏好等因素存在差异，在人工智能、太空、生物安全治理等新兴领域，大小国家之间能力差距和利益分歧很大。这不仅会影响各国对于安全议题的态度，也会影响各国的安全战略选择。传统安全观基于各国安全能力强弱，大多构建不对称的安全合作关系。全球安全倡议尊重各国之间的平等性，即便存在安全能力差异，也不影响各国自主、平等的合作，同时还要照顾安全能力弱国的正当安全关切。其三是各国安全合作方式的差异性。安全合作存在协商安全、合作安全、联盟安全、安全共同体等多种形式，各国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有不同选择。西方国家偏好联盟安全，无视各国安全合作方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甚至逼迫其他国家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选边站队。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选择结盟方式，特别是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使结盟变得越来越不合事宜。^① 全球安全倡议既提倡各国对于全球安全治理的共同参与，也重视各国安全关切、安全战略的差异性，协调推进各方扬长避短，共同打造安全合作新格局。

4. 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对话协商、多边治理，超越结盟分化的安全竞争。面对国际安全中的集团化、阵营化、安全化等态势，实现全球安全更加有效的治理必须依赖各方之间的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合作安全，与美西方的联盟安全存在显著不同。

其一是合作安全推崇“以和为贵”。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出的各种安全观都主张合作安全，并在全球安全倡议中再次得到彰显。合作安全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体现“以和为贵”的和平思想、“和衷共济”的世界情怀、“兼爱非攻”的格局品行和“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② 对于美西方国家泛安全化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合作安全更倾向“去安全化”，

^① 凌胜利：《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1—17页。

^② 刘卿：《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5期，第4—6页。

以改善全球安全治理。^① 其二是合作安全超越结盟对抗。美西方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结盟对抗思维，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不断拓展多边安全合作和强化联盟体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反对结盟对抗，主张对话协商，倡导结伴不结盟，既符合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现实，也有利于形成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其三是合作安全坚持多边主义。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视多边主义。合作安全不是简单的拉帮结派，而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合作，主张世界大事由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反对“一国独霸”、搞排外“小圈子”，撕裂合作对话。^②

总之，合作安全倡导通过对话来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政策沟通，增进各国战略互信，以合作来谋和平、保安全，化解冲突和争端，有利于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③

此外，全球安全倡议还致力于以整体安全超越局部安全。全球安全注重从全球层面看待各地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对各类安全问题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予以整体性认识。^④ 全球安全倡议突出了对整体安全的重视，符合人类社会相互依赖的现实，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中国实践

全球安全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当前安全挑战、破解人类安全困局、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稳定给出了中国方案，更体现在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之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一）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多边主义的象征，也是多边机制的核心。^⑤ 多边主义有真伪之分，“伪多边主义”以

① 任琳：《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处理好五对关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37页。

② 王帆：《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外交方略》，第144—145页。

③ 肖晞：《全球安全倡议的中国贡献》。

④ 刘卿：《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第6页。

⑤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8日，第9版。

多边主义为旗帜，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强调“小圈子”、“小团体”，借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把自己的“家规”强加给国际社会。^①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②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一是维护联合国权威地位。习近平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③中国主张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全球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支持联合国框架下制裁的合法性，反对单边制裁，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④面对海地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海地黑帮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制裁，^⑤共同维护北美洲地区安全。而针对以联合国为托词、实则挣脱联合国体系的单边制裁，中国并不认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明确表明立场，即停止单边制裁。反对任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⑥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单边制裁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外溢和反噬效应不断叠加蔓延，表明以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无济于事。

二是中国始终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国际安全问题解决。《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及相关国际法基本文件奠定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中国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时一向遵循上述原则。中东安全事务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地区安全问题错综复杂。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中国支持探索创新中东促和机制，主张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推动巴以和谈尽快走出僵局。^⑦中国积极发起巴以中三方对话，提出了推动巴以和平的“四点主张”。^⑧中国还积极倡议并参与金砖国家轮流举办的五国中东问题特

① 王毅：《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阔步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②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202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③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年9月24日，第1版。

④ 黄瑶、庄瑞银：《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4期，第1页。

⑤ 《中方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海地黑帮分子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人民网，2022年10月1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1018/c1002-32547327.html>。

⑥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4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⑦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8年7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第2版。

⑧ 即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进程；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

使会议，开展集体对话和磋商，寻求中东问题解决方案。^① 中东问题特使作为中国针对发展中地区热点问题设立的第一个特使，着力进行外交斡旋。^② 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一贯主张对话磋商、强调共同安全的立场和态度。

三是中国支持联合国机构在解决国际争端、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大维和摊款国。30年来，中国共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③ 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提出应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决策，让安理会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④

（二）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⑤ 劝和促谈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外交立场和理念。^⑥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地区的热点和敏感问题上，发挥了重要调解作用。劝和促谈，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这也使得中国在面临冲突和争端问题时，首先想到用和平方式解决，而非直接诉诸武力。全球化时代，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仅无助于解决冲突和分歧，还会造成连锁负面效应，危害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劝和促谈就是基于和平目标，采取政治、外交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和安全问题。劝和促谈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政治外交努力，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而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劝和促谈。^⑦ 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愿为劝和促谈发挥建

①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出席金砖国家中东事务副外长级磋商》，外交部网站，2019年7月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wb_673085/zjz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679100.shtml。

② 孙德刚、吴思科：《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页。

③ 《2022年10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年10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210/t20221018_10785260.shtml。

④ 《2023年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02/t20230202_11018699.shtml。

⑤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新华网，2023年2月24日，http://www.news.cn/2023-02/21/c_1129382628.htm。

⑥ 《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金砖合作再出发）》，《人民日报》，2017年9月8日，第3版。

⑦ 《王毅：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劝和促谈》，人民网，2023年2月1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19/c1002-32626562.html>。

设性作用，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① 面对乌克兰出现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国又提出了“六点倡议”，^② 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寻找交汇点。在与美国、法国、德国、印尼、西班牙、欧盟等领导人会晤时，中国始终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各国和联合国开展斡旋。中国也在湄澜合作外长会、二十国集团外长会等多边平台表明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③ 在联合国审议乌克兰问题时，中国提出当务之急是劝和促谈，治本之策是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④ 2023年2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局势紧急特别会议上，阐明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⑤ 随后，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提出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帮助冲突各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⑥ 在乌克兰危机上劝和促谈，体现了中国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理念。

（三）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全球化进程促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加，并与传统安全问题共同构成安全威胁。面对两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不断叠加的挑战，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多措并举、多管其下、统筹应对的化解之道。

一是寻求安全问题的多样化解决之道。新冠疫情暴发促使生物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生物安全虽然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转变为生物武器等传统安全性质的问题。中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治理即体现出多样化特点。在国内，中国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① 《2022年3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1_673025/202203/t20220308_10649759.shtml。

② 一是人道主义行动必须遵守中立、公正的原则，防止将人道问题政治化；二是全面关注乌克兰的流离失所者，帮助他们得到妥善安置；三是切实保护平民，防止乌境内出现次生人道灾害；四是保障人道援助活动顺利、安全开展，包括提供快速、安全、无障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五是确保在乌克兰外国人安全，允许他们从乌克兰安全离开，并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六是支持联合国在对乌克兰人道援助方面发挥协调作用，支持联合国乌克兰危机协调员的工作。

③ 《王毅就出席湄澜合作外长会、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访问东南亚五国、主持同越南、柬埔寨双边机制会议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7月15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07/15/content_5701076.htm。

④ 《王毅：中国始终是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外交部网站，2022年9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jzbhd/202209/t20220925_10771178.shtml。

⑤ 《联大通过“和平公式”决议草案，中方呼吁尽快实现停火止战》，海外网，2023年2月24日，<http://news.haiwainet.cn/n/2023/0224/c3541083-32565090.html>。

⑥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体系加强管控。在国际上，中国加入并维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推动生物武器核查机制，加强与各国的绿色发展合作，如中国与蒙古国、越南、老挝等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中国持续加大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力度，已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地区层面，中日韩开启了数轮“中日韩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中国与东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中心。^① 中国对生物安全治理的多样化，缓解了生物安全带来的困境。

二是对安全问题标本兼治。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其多样性特征，大多属于非军事领域，但有些又带有一定的军事、暴力特征，如恐怖主义、跨境犯罪等，这些问题仅靠单一手段难以解决，需采取多种手段、标本兼治，防范其衍化为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反恐是各国的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加强协调，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② 中国积极支持世界各国打击恐怖主义，支持联合国一系列反恐决议，推动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中国先后批准加入了12个全球性的国际反恐公约，参与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反恐合作。^③ 中国积极排除恐怖主义安全隐患、防范渗透和打击罪犯，同时加强国际交流，深化反恐合作，联合打击外溢的风险和威胁。针对一系列跨境犯罪问题，中国推动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再以打击毒品犯罪为例。中国推进互派联络官制度，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六国七方”谅解备忘录。中国还依托互联网，推动构建完善的毒品治理信息共享平台，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多方合作扼制毒品犯罪。

（四）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对话协商是中国解决地区冲突、化解安全风险的重要方式。对话协商意味着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各国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和平相处，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反对脱钩断链和单边制裁，

^① 许利平：《中国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智慧与方案》，《人民论坛》，2022年第15期，第34—37页。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③ 《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反恐怖工作情况》，澎湃网，2021年7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78268。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意味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倡包容互鉴。

沙伊和解是中国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际安全问题的最新实例。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大竞争对手，长期处在纷争当中，甚至在2016年两国再次断交。中国一直关心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沙伊两国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2023年3月6日至10日，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两国的高官在北京举行对话，两国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启动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①沙伊北京对话可谓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重大利好，也成为有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②王毅表示，沙伊改善关系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打开了道路，也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中国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中国倡导所有矛盾分歧都通过对话寻求政治解决，维护世界和平稳定。^③在力促沙特与伊朗复交的同时，中国还围绕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探索新思路，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④

（五）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内涵丰富，是一个集观念、目标、状态和能力等诸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一种预防性的安全范式和国家安全战略。^⑤推进可持续安全，其核心在于结合其丰富内涵，兼顾发展与安全。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统筹安全与发展，中国始终在进行实现可持续安全的探索。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关系到人类的持续发展与安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成为滋生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来源。中国在自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11日，第7版。

^② 《王毅：沙伊北京对话是和平的胜利》，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3/t20230310_11039102.shtml。

^③ 《王毅主持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闭幕式》，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3/t20230310_11039120.shtml。

^④ 孙德刚：《中国为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贡献正能量》，《新民晚报·深海区》，2023年3月14日。

^⑤ 刘江永：《可持续安全真谛与战略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5年第1期，第43—67页；余姣：《论中国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安全合作》，《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8页。

实践的基础上,积极为世界贫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中国加强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减贫合作,通过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平台,传授自身实践经验,帮助他国减贫扶贫。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连续三年通过农村减贫决议,发布《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实践》减贫案例选编。此外,中国还提供对外援助,为陷入战乱及地区冲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安全提供了宝贵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 语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全球安全治理力有不逮。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国博弈加剧、地区热点升温、国内冲突频发,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局面,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凸显,改善全球安全治理日益迫切。为此,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其理念主张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脉相承,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经验与智慧。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既有理念指导,又有行动指南,对于改善全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明确提出要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多边主义、互利共赢和统筹兼顾五大原则,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过程中已然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推动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还需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国际安全合作的合法性导向。安全问题重大敏感,国际安全合作的合法性是决定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师出有名”才能得到更多国际理解和支持。为此,要始终支持联合国的安全治理核心作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遵循国际安全合作的渐进性。国际安全问题大多错综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经纬,很难一蹴而就加以解决。三是坚持国际安全合作的综合性。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态势,需要综合调动各类力量、运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集结资源,因地因时妥善处理。四是坚持国际安全合作的发展性。国际安全变动不居,无论是安全议题还是安全合作都处在变化当中,与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发展视角看待国际安全合作,搁置争议等待时机成熟、谋求“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有机结合,方可推动全球安全合作行稳致远。

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是安全理念分歧。理念引导行

动，凝聚理念共识是共同行动的重要基础。美西方传统安全理念根深蒂固，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并不被美西方国家所认可，还有不少国家深受影响，中国的安全理念上如何与这些国家达成共识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安全理念差异更加难以弥合，势必影响全球安全合作的开展。二是全球热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能否推动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是检验全球安全倡议效果的重要晴雨表，也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安全倡议的态度。目前看来，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更多是纲领性意见，对于解决具体热点问题还需要更加具体细致的行动方案。何况在全球热点问题中大国博弈、历史经纬、宗教文化等因素都非常复杂，全球安全倡议很难立竿见影。中国应立足周边，因时制宜，徐图后进，树立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典范。三是大国协调困难。毋庸置疑，大国协调对于全球安全合作至关重要。当前大国协调愈发困难，也使得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更加不易。四是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安全议题多样化、安全主体多元化、安全机制低效化，这些都使得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更加迫切。

大道不孤，全球安全倡议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最近“沙伊和解”正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全球安全问题基于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合理解决。尽管当前中国推动全球安全倡议面临不少阻力，但这毕竟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积极作为的努力尝试。以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作用更加显著，而通过提供更多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将更加全面均衡地发挥大国作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也必将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最终目标。

（责任编辑：陈志瑞）